

# “共同富裕”究竟什么样



张弓慢评

张 弓

正当全党全国热烈庆祝建党百年大喜日子，本月上旬，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之后，浙江全省几乎所有重要媒体全文转载，全省人民奔走相告，直至今日，议论的声音一直处于高潮之中。

对于浙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事、喜事。这也是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中央把第三个“超级大礼包”发给了浙江。2019年8月18日，深圳获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2020年11月12日，浦东被批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之后不到一年，浙江被支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央三年连续发送的“三个大礼包”，都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

前两个“礼包”都冠有“社会主义”四个大字，浙江这一个“礼包”，虽然名称上没有“社会主义”四字，但“共同富裕”本身就属于社会主义的“专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先别说意见之中丰厚的内容，仅就文件标题上出现的几个新词，也着实令人精神振奋。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不正是全省人民长久盼望的目标吗？这不就是我们党成立之初就确立的宗旨吗？而这美好的一切，就将在我们手里实现。

何为共同富裕？作为“示范区”的浙江人，这是首先要弄明白的。《意见》里有关的一段话，是这样表述的。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互相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这段话虽不足百字，却含义丰富，要求极高。领悟其中的内涵，

须先抓住其中的几个关键词组。

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创造者与享受者，是“全体人民”。当然，这里所指的是全体浙江人。就是说，是全部浙江人，而不是一部分浙江人，更不是少数浙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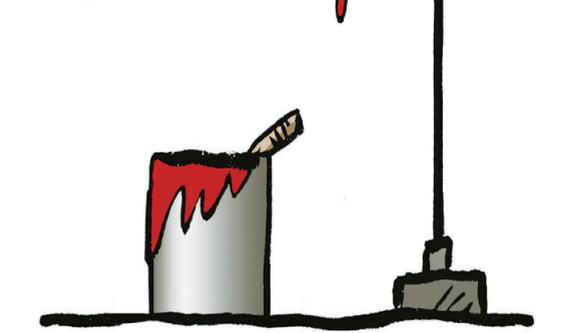
二是“普遍达到”。全体浙江人民需要普遍达到的是什么样的“富裕”呢？《意见》列出如下标准：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我们很多人最初看到“共同富裕”四个字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经济上的——经济收入提高，物质生活富足。可是“口袋”上的富，只是其中一部分，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远不是“共同富裕”的全部，还必须包括“脑袋”上的自信、自强，环境上的宜居、宜业，社会上的和谐、和睦，公共服务上的普及、普惠。这样一想，难度之高恐怕就会感觉到了。

三是两项“全面”。两项“全面”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这么说，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共同富裕。在富裕问题上的落差与分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存在差距。同理，

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社会很有钱，但其他方面很落后——这样的个例会有，但这种畸形的富裕，即使一时因为有些特殊原因实现了，但绝不可能“共同”和“持久”。

四是“辛勤劳动和互相帮助”。这指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全体人民需要付出“辛勤劳动”，而不能盼望“上天恩赐”“天上掉馅饼”。在这个前提之下，还要推动互相帮助，富的帮穷的，强的帮弱的。就像我们在脱贫阶段做得非常成功的“扶贫帮困”那样。互相帮助、共同致富，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当然，这种帮扶，需要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避免挫伤先富群体的积极性，强化后富群体的依赖性。

正是怀着对共同富裕的渴望心情，反复阅读、仔细领会文件精神，广泛浏览有关专家的解读文章和网民们的热切反应，笔者总算对这个“共同富裕”，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篇大文章，需要继续学习和研究的问题很多，上述想法和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无 题

王永琦 绘

## 超5成年轻人不再首选一线城市折射时代进步

丁慎毅

6月是毕业季也是选择季，此时年轻人最关心哪些人生选择？中国青年网和互联网平台联合发起的调查显示，3个选择最受年轻人青睐：找工作应该看重爱好还是面包，先攒钱还是先生活，大城市打拼还是小城市生活。大多数年轻人给出的答案是，对于工作他们更看重能获得、薪资待遇和人际关系，超5成年轻人不再首选一线城市（6月22日中国青年网）。

即使在5年前，还有很多年轻人仍然坚持漂在北上广深，据媒体调查，其原因主要是在一线城市人际关系简单使得就业以及在职场上打拼更公平，其次是机会多、薪资相对较高、文化氛围浓等。现在超5成年轻人不再首选一线城市，不是一线城市不好了，而是新一线和二线、三线城市变得更好了。

在互联网社交时代，年轻人时刻在进行城市对比。北上广深产业结构和城市结构的深层调整，对一些年轻人来说，机会不再那么多了，相对而言，房价的高涨等会使他们付出更大的成本。

反观新一线和二线、三线城市，人际关系方面同样在变得透明简单，城市的产业链完善升级，使得年轻人的创业机会比一线城市更多、成本更低。而当地房价又比一线城市低，文化氛围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以

前排在第一位的“人际关系”现在排在了第三位，而“重技能获得”的机会则排在了第一位。这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折射，也是现在年轻人更加注重技能的实干精神的反映。

以新一线城市为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相关数据显示，不管是滴滴最大的新用户增长点、外卖快速的增长点，还是BOSS直聘的大数据，都显示出新一线城市更具发展潜力。究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清明和治理效能的提高、落户的宽松、住房政策的改革、公共服务对年轻人的支持等，使得新一线城市与北上广深差距正在缩小的同时，又凸显出各自独有的优势。比如，选择互联网企业就业的年轻人，会首选在杭州就业。

进一步说，不管在哪个城市，人们生活时间最多的场所是社区。如今，“15分钟便民生活圈”和“15分钟文化圈”在新一线城市得到了更好优化，有的甚至比一线城市更便捷。它反过来又推动城市需求结构升级和供给能力提升，推动供需实现动态均衡，增强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和一线城市相比，当人际关系成本差不多，当薪水差距逐步缩小，而提升个人技能机会更多的时候，对于更需要机会来实现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三线城市的发展，恰好可以满足年轻人的这份激情，那么，超5成年轻人不再首选一线城市就成为社会进步的必然。

## 游戏卡牌拍出8000余万元 司法拍卖不是儿戏

盛 翔

6月21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游戏王卡牌“青眼白龙”。这张起拍价80元的卡牌，被迅速加价到8732万余元。因“拍品与实际竞拍价格严重不符，可能存在恶意炒作与竞价行为”，本场拍卖被宣告中止。有网友称，阿里拍卖救了拍价网友“一命”。

据悉，这款纯金“青眼白龙”卡牌限量发售500套，官方定价1万多元，市值估价每张在20万到30万元。那起拍价为何才80元，评估价才100元呢？原因在于，它缺少非常关键的证书，难以直接辨别真伪，只能当作普通卡牌估价。

一张价值可能30万元的游戏卡牌，起拍价仅区区几十元，难怪会引来大量网友围观。在一般人眼中，一张游戏卡牌或许一钱不值，但在游戏迷眼中，则价值连城。但是，此次游戏卡牌拍卖，最终价格居然为8732万余元，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又翻了两三百倍，存在明显的恶意炒作可能。

此次竞拍的门槛很低，相关竞拍者只交了不过百元的保证金，这些人可能根本不清楚胡乱加价的后果，以为最多不过是损失保证金，故而起哄加价，拍着好玩。殊不知，悔拍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保证金不予退还，违约责任还包括承担因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金，特别是，重新拍卖的价款如果低于原拍卖价款，所造成的差

价损失，需由原买受人承担。

8732万余元的离谱出价，已经远远超过30万元的市场估价，如此巨大的差价需要填补，胡乱出价者倘若巨富，即便倾家荡产，大概也很难赔得起。而且，这是司法拍卖，在司法拍卖中恶意竞价，扰乱司法拍卖秩序的买受人，人民法院可以对其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好玩参与一次竞拍，竟面临如此沉重的法律代价，肯定是胡乱出价者未曾想到的。

这个意义上说，法院及时中止拍卖，的确堪称“救人一命”。尽管这些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在司法拍卖中恶意竞价”，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需法院裁决，可相比“一次可能会倾家荡产的玩笑”，法院的中止拍卖决定，依然非常人性化。同时，这是一次重要的普法教育，告诉人们，拍卖不是闹着玩的法盲游戏，竞拍者必须对自身行为负责，一真是真的想竞拍，二是出价必须量力而行，否则一旦悔拍，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愿这次普法教育，能够警醒非理性参与司法拍卖的人。此次事件还暴露出网络拍卖的一个漏洞，那就是竞拍者可以用很少的竞拍保证金，随意报出动辄几千万元的天价，进而扰乱拍卖秩序，甚至恶意影响拍卖。在缴纳竞拍保证金的基础上，对严重超出保证金的报价行为，要不要额外补缴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遏制不理性价行为，或许有必要在制度层面进行考虑。

## 工伤认定亟待与时俱进

丁家发

现代人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引发疾病并导致伤残、死亡的现象屡屡发生，如果仅以死亡与否、抢救时间等作为工伤认定的判断标准，难免被质疑有失公平，还可能发生伦理风险。今年5月，多起职工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超过48小时后死亡被认定为工伤的判例引起社会热议（6月22日《法治日报》）。

根据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只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48小时时限”让一部分抢救超过48小时的死亡职工，无法获得工伤认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工伤认定不该局限于“48小时时限”，而应当按照工伤的实际性质进行认定，才能充分保障因工伤亡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伤“48小时时限”的规定，近年来备受争议。特别是因担工超过48小时无法认定工伤，少数职工家属会选择放弃治疗或抢救，这导致其陷入伦理困境，也有一些残忍。此前，武汉一位昏迷100多天的抗疫护士，就因为“48小时时限”等原因而无法获得工伤认定，享受不了相关工伤保险待遇。而类似情况，还不止她一人，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如此机械化认定工伤，缺乏人性化不说，于情于理也难怪公平。今年5月，多起职工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超过48小时后死亡被认定为工伤的案

例，可以说是对“48小时时限”个案的纠偏。

但工伤认定，不能靠个案来纠偏。否则，很难有一个公正的标准，也容易引发纠纷。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达，远程办公将成为常态，人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会发生很大变化，突破了《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作地点范畴，如果该条例不进行修订和完善，显然已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职工将被排除在工伤之外，也有违工伤保险的立法宗旨。因此，与时俱进修订和完善相关法规，就非常有必要。

有专家建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为工作原因直接导致疾病发作死亡或者抢救无效死亡、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认定为“视同工伤”。这样，既可以避免发生伦理风险，也可适当地减少与工作无关的突发疾病而被认定为“视同工伤”的情况，从而减少工伤保险的负担。其实，工伤认定不应该在抢救时间的长短上“做文章”，而应以“工作原因”为关键要素，实行“工作原因”推定原则。不论抢救时间有多长，只要职工确实是因“工作原因”而导致的伤亡，就应该认定为工伤，从而真正体现工伤认定的公平公正性。

工伤认定，事关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在《工伤保险条例》尚未修订和完善的情况下，各地人社部门不应再纠结于“48小时时限”，而应当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在实践中多一些温情，让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职工，能及时享受到工伤保险的福利。



**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 精神启后人**

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令李大钊备受鼓舞，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



**王尽美**

**尽善尽美唯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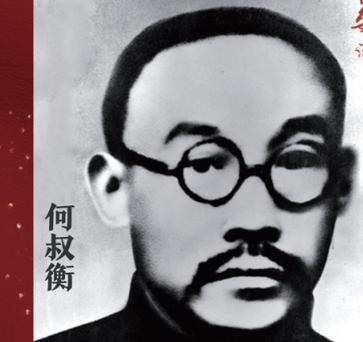
王尽美生于1898年，原名王瑞俊，山东人，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王尽美等人倡导下，5月，山东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几天后，数千名学生参加反日救国会，王尽美慷慨激昂，演讲一个多小时。

1921年春，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发起创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表达共产主义坚定信念，他激情赋诗：“贫苦阶级现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溯水泥沙流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他因此改名“尽美”以自励。

1921年7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赴上海，王尽美23岁。

在终日奔波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肺结核病，经常咳血。但他仍以带病之身奔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动工人罢工。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



**何叔衡**

**用生命践行铮铮誓言**

1876年，何叔衡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小刻苦勤奋。1913年，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在此，何叔衡结识了毛泽东，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友谊。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又于1920年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院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何叔衡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他用生命践行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邓恩铭**

**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

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25年，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领导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

1928年春，邓恩铭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后由于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铭身负镣铐，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0岁。